



05-4506832



pustaka.upsi.edu.my



Perpustakaan Tuanku Bainun
Kampus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PustakaTBainun



ptbupsi

现实主义的选择——郁达夫南来后创作取向与关怀的转变

PEMILIHAN REALISME – PERUBAHAN KECENDERUNGAN DAN
KEPRIHATINAN PENGKARYAAN YU DAFU DI NANYANG

叶美珊

YAP BEE SAN



05-4506832



pustaka.upsi.edu.my



Perpustakaan Tuanku Bainun
Kampus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PustakaTBainun



ptbupsi

TESIS DIKEMUKAKAN BAGI MEMENUHI SYARAT UNTUK
MEMPEROLEH IJAZAH SARJANA SASTERA (BAHASA CINA)
(MOD PENYELIDIKAN)

FAKULTI BAHASA DAN KOMUNIKASI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2017



05-4506832



pustaka.upsi.edu.my



Perpustakaan Tuanku Bainun
Kampus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PustakaTBainun



ptbupsi



谢辞

看着一地的相思豆，我确定自己来到了语文学院的侧门。见证着我从本科到读研历程的相思豆树，或许需要隔好一段时间才能见面了。回想着获得奖学金继续读研的那一刻，我该是为了有机会好好读书而喜悦的。感谢家人包容了我的任性，也希望自己往后在没有相思豆树的日子仍能保有一份专属的任性。

若没有许德发老师一路以来的鼓励，我或许自本科毕业后就不会再遇见这一棵美丽的相思豆树。许老师让我看到将学术视为生命的热诚，提醒着我不得怠慢。每当遇到难题时，许老师是解惑良药。每回收收到满满批阅印记的初稿，心里除了感谢，也暗自期许自己必须像许老师一样严谨对待学生的课业。除了论文，老师无时无刻不地灌输我们学术的规范，让我了解到学术并不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内就可以了事。若说读研必然赋予我一双新眼睛，那我必须感谢许老师不断开拓我的视野。

读研或许是孤独的过程，所幸的是，日常生活并不寂寞，有个解决“等下吃什么”之最大难题的伙伴，佩晶。六年来，我们常一起走过这棵树，她也总是耐心地等待着我捡起落了一地的相思豆。同样走在读研的路上，彼此的价值取向或许并非完全一致，但至少能做到聆听彼此。感谢她往往在我彷徨之时，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陪我跨过眼前的坎。读研、做论文的日子难免苦闷，在此必须不落俗套地感谢所有“饭友”与一直默默陪伴的友人。

短短的几年间，我因为读研而意外地遇见了许多人，感谢路上的每一位，纵使可能只是擦肩而过。





摘要

本研究将循着早期郁达夫个人主义思想的线索去探析其思想上的转变，进而探讨其思想变化如何影响其创作取向与个人关怀。本文将以“大我”（现实主义）与“小我”（个人主义）的视角，分析郁达夫徘徊其间，并厘清其创作取向与关怀之转变。郁达夫的南渡是以抗战下的大离散为背景，他必然面对家国危机，但同时也必须直面迥然不同的南洋与离散的华人社会情境，故本文将会以离散的角度来探讨郁氏思想与创作取向的变化。本研究揭示了郁氏从小我走向大我情怀的曲折历程，而大我情怀或现实主义书写成为其南来后的写作与关怀基调。郁氏南来后的现实主义倾向主要彰显于其写作内容与体裁的选择。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梳理郁氏的思想变化，并厘清他从个人主义写作走向现实主义的轨迹。





PEMILIHAN REALISME – PERUBAHAN KECENDERUNGAN DAN KEPRIHATINAN PENGKARYAAN YU DAFU DI NANYANG

ABSTRAK

Kajian ini meneliti perubahan pemikiran Yu Dafu dengan menuruti aliran pemikiran individualisme yang dipegang teguh olehnya sejak era Gerakan 4 Mei, dan seterusnya menganalisis kecenderungan dan keprihatinan pengkaryaan beliau selepas berhijrah ke *Nanyang*. Kedatangan Yu Dafu di *Nanyang* merupakan pergerakan diaspora yang terdesak akibat Perang China-Jepun, beliau tidak sahaja berhadapan dengan krisis negara China, tetapi kedatangan beliau juga perlu berhadapan dengan konteks *Nanyang* dan komuniti diaspora Cina yang jauh berbeza dengan ibu pertiwinya. Justeru, kajian ini meneliti perubahan pemikiran dan kecenderungan pengkaryaan beliau dari perspektif diaspora. Dapatan kajian ini menunjukkan perubahan Yu Dafu dari individualisme ke realisme, maka penulisan realisme telah menjadi asas kepada pengkaryaan dan keprihatinan beliau di *Nanyang*. Kecenderungan penulisan realisme Yu Dafu di *Nanyang* terpapar dalam pemilihan isi penulisan serta genre penulisannya. Implikasi kajian ini telah menunjukkan perubahan pemikiran Yu Dafu serta memperjelaskan penghaluan beliau dari individualisme ke realisme.





目录

	页数
个人声明 (PENGAKUAN)	ii
谢辞	iii
中文摘要	iv
马来文摘要 (ABSTRAK)	v
目录	vi
图目次	ix
表目次	x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2
第二节 研究问题	3
第三节 研究目的	5
第四节 研究范畴与限制	7
第五节 术语界定	8



第二章 文献回顾	11
第一节 关于郁达夫到南洋前之研究	12
第二节 关于战前南来文人之研究	16
第三节 关于郁达夫与南洋的研究	19
第四节 小结	25
 第三章 研究途径与方法	 26
第一节 研究途径	27
第二节 研究方法	34
第三节 章节安排	35
 第四章 郁达夫南来前的个人主义观及其作品概况	 37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个人主义观	38
第二节 “自我就是一切”的年代（1921-1925）	41
第三节 直面中国现实的时期（1925-1933）	52
第四节 从归隐走向抗战之路（1933-1938）	59
第五节 为国南下的契机	67
第六节 小结	71
 第五章 书写当下：南来后走向大我的现实主义	 73
第一节 郁达夫的大我观与现实主义	74
第二节 抗战中的马华文坛与郁达夫南来后的心境转换	77



第三节	当下的关怀：在家国之外关注家国的现实	86
-----	--------------------	----

第四节	小结	100
-----	----	-----

第六章	书写南洋：从中国走向此时此地的现实	102
-----	-------------------	-----

第一节	郁达夫南来前的南洋印象	103
-----	-------------	-----

第二节	郁达夫南来后的南洋及其对南洋现实的观照	109
-----	---------------------	-----

第三节	郁达夫在南洋关怀与认知结构	121
-----	---------------	-----

第四节	小结	135
-----	----	-----

第七章	书写文体之选择：南来后创作形式的转变与因素	138
-----	-----------------------	-----

第一节	郁达夫在南洋的各文体创作之概况	139
-----	-----------------	-----

第二节	时代因素	143
-----	------	-----

第三节	南洋的环境因素	149
-----	---------	-----

第四节	个人因素	156
-----	------	-----

第五节	小结	165
-----	----	-----

第八章	结论	166
-----	----	-----

参考书目		
------	--	--

附录		
----	--	--



图目录

图示	页数
3.1 从离散视野去看郁达夫之转变	33



表目次

表示

页数

- 7.1 郁达夫各年份不同文体创作的概况
(以《郁达夫全集》为准)

140





第一章

绪论



郁达夫的一生可谓漂泊不定，从故乡浙江富阳到杭州求学，再转到日本完成高等教育。即使学成回到中国后，他似乎亦未能为自己觅得安身立命的栖身之所。抗战时期，或许背负着到海外宣传抗战意识的使命，亦或是抱着能与王映霞破镜重圆的想法，郁达夫于1938年12月28日携着王映霞与儿子郁飞抵达新加坡。当时郁氏曾向友人透露：“我这次来《星洲日报》做工，打算长住在南洋，不愿再回中国去了”（温梓川，2006，113-114）。虽然无法从郁达夫的话语中断言他留在南方的决心，但至少一开始他是做此想的。

郁达夫留新担任《星洲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期间曾在马华文坛掀起一波波的涟漪。其南渡后的文字与前期留日，或在中国期间所留下的创作存在着一





定的差异。诚然，对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或许已无法一一重现，惟郁达夫在逗留新加坡期间为马华文学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本，而其漂泊一生的终点站南洋亦值得我们加以探究。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郁达夫于 1921 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沉沦》，并在五四文坛闯出名堂。惟因其对肉体、性、酒等的描写而被部分人誉为“肉欲描写者”，¹一般人亦将《沉沦》定位为“不道德的小说”。²

夏志清（1961/2015）曾在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内评析郁达夫于南洋的情况：“1938年，他在新加坡主编一份报纸。1942年日军攻陷这个地方，他逃到苏门答腊，化名隐匿，到战事结束为止；可是胜利后不久，日警抓到了他，把他杀害。他身为作家，既非共产党，也不很爱国，遭到这个下场可以说是万想不到的”（83）。此外，夏志清于该著作有关郁达夫的论述中也认为郁氏于1928年后的作品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夏志清除了以“主编一份报纸”来概括郁氏在南洋的晚期生活，也为郁氏冠上“不很爱国”的头衔。另一位学者李欧梵（1973/2010）亦曾发表：“大约四十岁左右，当他终于决定安定下来时，他的痛苦全没有了，同时他的创作冲动和作品的影响力也没有了”（80）。显然，李欧梵（1973/2010）认为中年的郁达夫再也未曾萌生创作小说

¹苏雪林是其中认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风格乃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郁闷，并将之视为荒唐颓废的现代作家。关于苏雪林对郁达夫的批评可见苏雪林（2010[1934]，333）。

²透过周作人的〈《沉沦》〉可一窥当时很多人视《沉沦》为不道德的作品。见仲密（2010[1922]，265）。





的念头，其影响已全然消失，在南洋过着近乎隐士的生活，其创作能力更是消退了。从以上两位学者的论述中可窥见，许多20世纪中后期显著的研究皆认为，这一位在五四时期的颓废作家能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发挥的效用及影响可谓微乎其微。然而，李欧梵（1978）在为秦贤次所编的《郁达夫抗战文录》撰序时，不禁为自己早期曾经否定郁达夫在南洋的贡献等的言论进行自我批判，他坦言“自己对郁达夫晚年的成就未免估价太低”（二）。李欧梵前后相悖的论述说明了郁达夫在南洋的文章虽不如其前期在中国时的小说创作般光芒四射，不过，相关文章仍有作进一步考究的空间与必要。

诚然，郁氏早期的小说创作及其光芒过剩，令对南洋或新马不熟悉的学者无法想象郁达夫晚年在新马文学起着如何的作用。反观，新加坡学者林万菁（1978/1994，48）则认为郁达夫乃众南来作家中影响最大，成就也格外显著的一位。显然，在五四时期因《沉沦》一书而蜚声文坛、更曾被誉为“肉欲描写者”的郁达夫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发轫期所扮演的角色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第二节 研究问题

苗秀（1958，416）曾指出，抗战时期，一部分本地人或对郁达夫存有成见的人士皆矢口否认郁氏在马华文学运动的贡献，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主编《晨星》的成绩还不及前任的编者。从前文提及的夏志清、李欧梵再到上述所谓的某些本地人之态度，我们可瞥见好一些人并不认同郁达夫在南洋文艺界的贡献或付出，这可能因其“颓废作家”的刻板印象或是认为郁氏在南洋难以大展拳





脚等因素所致。尽管如此，苗秀认为郁达夫乃是与鲁迅、茅盾等人齐名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当时的《星洲日报》重金聘请郁氏南渡来主持副刊编务，其主要原因也许欲借郁达夫的名气来号召读者（苗秀，1958，412）。在抗战时期抵新的郁达夫或许予人“逃难”、“避战”等的印象，不过这或许并不是事实的整体。

虽然一部分人轻视了郁达夫在新马文学的影响，然而，除了前文提及的林万菁非常重视郁达夫在马华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外，方修亦认为郁达夫留给新马读者的政论散文乃其在新马期间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政论有别于郁氏青年时期那种感伤的浪漫主义以及中年时期那种名士型的闲情逸致，取而代之的是严肃平实的议论、坚定乐观的态度以及为正义与和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方修，1977，4）。从青年、中年再到晚年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方修（1977，4）认为郁氏晚年的思想似乎有着一番飞跃和进步。方修并不仅仅将郁达夫的成就置于是否生产出文学作品的层面来论述郁氏的“飞跃和进步”，方修更多的将郁达夫放在是否履行南来文人之抗战大任的角度来量度其思想上的变化。当时的郁达夫除了政论散文，他更因身为报章文学副刊的编辑，而常撰写文艺短论，这一批文艺短论不只丰富了殖民地时期马华文学的文库，它们亦成为研究郁达夫晚年思想的重要线索。不过黄锦树（2006）则曾言郁达夫“南行之后，论新文学业绩，实在乏善可陈，尽的是报人的职分，写写政论、杂文、编按。文学创作上的表现，就是几篇散文和百余首旧诗”（101）。

显然，对于郁达夫晚年的思想与创作可谓众说纷纭，惟从他后期所留下的文章可看出其晚年思想与创作的转变乃不容置疑的事实。值得我们探析的





是：郁达夫在五四个人主义高涨的时期从文坛冒出头来，这一种个人主义是否伴随他至抗战时期，或在这十余年间他究竟出现了怎样的改变？本文将沿着郁达夫的个人主义观去探析其思想与创作上的转变。在南洋时期，郁达夫并未留下让他叱咤中国现代文坛的小说。反之，其政论散文、文艺短评及旧诗等写作却不辍，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在南洋的郁达夫不再生产小说？其转变的因素或许有助于窥见郁氏后期思想与创作上的部分关键，这亦或许说明郁达夫的创作与空间上的漂泊或思想上的转变息息相关。

南洋与中国的外在环境、文学氛围等基本上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差异，南来后的郁达夫面对抗战这一时代巨变，仍然持续关注家国，但其写作关怀体现了怎样的变化？作为新加坡的他者，他必然无法忽视本土的情况，但对于本土的关怀，他究竟有多深入？本文将循着郁氏在南洋的写作题材去探讨他笔下的家国与南洋如何呈现其南来后关注与关怀的转变。

第三节 研究目的

诚如前文所述，郁达夫在新马文学史上的地位仍未能获得全面的肯定与认同。近年的研究亦有认为郁氏在新马的表现力欠佳，文学业绩实在乏善可陈（黄锦树，2006，101）。因此，厘清郁氏南来前后的转变或许是为郁氏在新马文学史上作出定位的方式之一。





本研究认为郁达夫的转变必然与其思想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故本文将从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潮之一——个人主义来窥探郁氏的思想变化。透过对郁达夫晚年在南洋完成的文章与前期的文字作对比，本文能分析与理解郁达夫个人主义观的转变。郁达夫于七·七后南来，南来后的他夹带着大时代的冲击，加上地理上的迁移，其思想亦有所变化。本研究将探讨其思想变化如何影响其留新期间的写作题材。通过探讨郁氏南来后的文字对家国与南洋的关注，我们将能厘清其南来后写作题材上的关怀及其转变。除了写作题材上的转变，我们发现郁氏南来后并无小说创作，这一让他闻名于中国文坛的写作体裁竟然缺席于其留新期间的笔耕亦是其南来后的转变之一。本文将通过郁氏的创作概况厘清郁达夫南来前后文体选择上的转变及其因素。



本研究盼能循着郁达夫前期的个人主义观的主线去探讨郁氏南来后题材与体裁的转变，纵使其中未能最全面的呈现郁氏的思想面貌，但至少透过此一视角去拼凑郁氏在南洋的笔耕，以让他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的定位更明确。





第四节 研究范畴与限制

上文已阐述本研究之背景、动机、问题与目的，为能更严谨地探析此课题，本节将为本研究所涉及的文本与时限设限。

（一） 文本分析范畴

本文主旨乃研究郁氏的“转变”，故其前期（即到南洋前）的作品亦须纳入分析范畴，以便作前后期的比较。惟本研究著重于郁达夫在南洋期间的思想与创作之转变，因此，本研究将着眼于其在南洋期间的文本，从而分析其眼中的南洋及其南渡后的各方面转变。而其前期作品仅作为基本参照点，并着重于综合分析之文献，而非自行进行深入分析。

本研究的轴心乃探讨郁达夫在南洋期间（主要是新加坡）的笔耕成果与其前期创作上的差异。故本文将以王慷鼎与姚梦桐（1987）合撰的〈郁达夫南游作品总目初编〉中所列出有关郁达夫晚期于新加坡的 471 篇的文章作品目录为参照点，并收集相关文献以进行重点分析。此总目乃王、姚二人透过各种资源（各种郁达夫南来后的文集、胶卷等）列出郁达夫在南洋的写作成果。此篇目乃至目前为止，关于郁氏南来后作品较为全面的总目。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并通过整合《郁达夫全集》与胶卷以获得相关文本（参见附录 A）。

然而，郁达夫完成于南洋的作品不只刊登于南洋的各大报章，中国与香港亦是其文章的发表园地。有碍于资源的缺乏，本研究并未能从故纸堆中或旧





报刊胶卷去重新整理郁达夫南游期间的作品总目。本文因主要从王、姚所编的〈郁达夫南游作品总目初编〉与《郁达夫全集》中的篇目整合，故对于郁达夫南游期间的所有文本之收集可能仍有遗漏。

（二） 时间范畴

本研究涉及郁达夫南来前后的转变，而主要着眼于郁达夫南来后的转变及其创作取向，故本文主要研究郁达夫在新马期间所留下的文学遗产及其逗留南洋期间的经历，即他踏足新加坡的 1938 年 12 月 28 日至他坐船撤离新加坡到印尼的 1942 年 2 月 4 日。



第五节 术语界定

（一） 马华文学

本研究所牵涉的时间范畴属于战前，即是马来西亚独立前，当时的西马半岛与新加坡被统称为马来亚（Tanah Melayu）。马崙（2004，3）曾言，新、马和沙巴与砂拉越于 1963 年合并成为马来西亚；1965 年，新、马却分成两个独立的政治单元。随着新、马的分家，“新加坡文学”也脱离了马来西亚，1965 年后所谈及的“马华文学”不宜与“新马文学”一概而论。





杨松年（2000）亦认为“在马来亚独立前，或更正确的说，在新加坡独立之前，新马关系非常密切，新马文学的互动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然而新马两国的分家，不但在政治上各走各的路，文学上也是分道扬镳”（5）。显然，马来亚华文文学或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一词包含新加坡文学可沿用至新加坡正式脱离马来西亚之时，即 1965 年 8 月 9 日。一言以蔽之，1965 年 8 月 9 日前的马华文学乃包含新加坡华文文学的马来亚华文文学或者马来西亚华文文学；1965 年 8 月 9 日后的马华文学则是不含新加坡华文文学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

因此，本文所使用的“马华文学”一词乃是新马未分家前、战前的马来亚华文文学。



（二） 南洋

本研究多处涉及或沿用“南洋”一词，“南洋”的运用主要代表早期的华人移民迁移的方向。

据许云樵（1961）言“南洋者，中国南方之海洋也，在地理上，本为一暧昧名词，范围无严格之规定，现以华侨集中之东南亚各地为南洋”（3）。而在《中国南洋交通史》（冯承钧，2011）中记载：

今之所谓南洋，包括明代之东西洋而言。东西洋之称，似首见《岛夷志略》著录，然至明代盛行。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刺以西，质言之，今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昔日大食人以此两地为印度与中国之分界。然在元以前则概名之曰南海，或西南海。兹编研究之范围，东起吕宋，西达印度西岸，阿刺壁海西岸诸地不录，安南、占城、缅甸、暹罗四国亦不著于编；安南原列中国郡县；昔之占城为今安南之中南圻；





缅甸与中国交通常遵陆而不循海；暹罗至元代始何为一国，元以前其南境先隶扶南，后为杜和钵底国也。（1）

从引文可见，冯承钧在编写中国与南洋间的交通史时给“南洋”定下了范围。

而王赓武（2002）后来给南洋下的定义亦与冯承钧的定义近似：

南洋（*Nanyang*），南方的海洋（*Southern Sea*）的字汇已被更近代化的新名词——东南亚所取代；但是其中有一重要差异，在“南洋”的字汇中所含的指示乃这个领域是经由海路——南中国海而抵达的。因此，这个范围特别关涉到东南亚沿海狭长的大陆地带，和菲律宾及印尼的众多岛屿的南洋华人。由于如此，华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从陆路进入越南、寮国、缅甸和暹罗的都不包括在这个范围。（1-2）

从上文可见，“南洋”虽常被定义为东南亚，惟其中显然以“洋”为主，故印度支那、缅甸、泰国那一块大陆一般不被视作“南洋”的一部分。而本文所指的“南洋”循王赓武所指，并特指郁达夫南渡时曾踏足的国土，即新加坡、马来亚半岛与印尼。





第二章

文献回顾



郁达夫于五四时期冒出于中国新文学的文坛，而《沉沦》乃其成名作之一。作为创造社成立初期的主将，郁达夫的创作打从一开始就烙上了“浪漫主义”的印记。李欧梵（1973/2010，80）曾经认为到了南洋后的郁达夫之创作力尽失。而如前文所述，当郁达夫于南洋失踪或逝世后，有者更认为他在南洋时期并无作为。

除了少数新马研究者如：林万菁、王慷鼎、姚梦桐、黄锦树等人曾着手探讨郁氏在马华文坛所留下的笔耕外，关于郁氏到南洋前后的转变却甚少有人关注或探讨。探讨其中的“转变”可厘清郁氏从成名到“创作力尽失”的缘





由，亦可进一步理解郁氏南来后的具体变化。本章将梳理和检视与本研究课题相关的研究概况，以便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探析郁氏的转变。

第一节 关于郁达夫到南洋前之研究

关于郁达夫到南洋前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故本文只能选择性地论述其中较为显著的研究结果。大体上，这些研究的基调可分为两大类，一则正视郁达夫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二则否定郁达夫的创作，有者甚至认为其创作为文坛带来了消极的效应。此外，日本亦有学者经营有关郁达夫早期创作的研究。



上世纪中后期，汉学界有不少专门或设专章讨论郁达夫及其创作的研究（夏志清，1961/2015；安娜·多勒扎诺娃，1985[1971]；李欧梵1973/2010；钱格，1985[1978]；普实克，1985[1980]），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为其中标志性的研究。李欧梵（1973/2010）于其论著中特辟两章来探析郁达夫的生平（1896-1945）及其早期的作品如〈沉沦〉、〈采石矶〉、〈日记九种〉等。对于郁达夫的生平，李欧梵做了详尽的说明及阐释，惟在南洋期间的概况则着重于阐述其婚姻生活，而忽略了他在南洋的编务活动及其对马华文艺界所起的作用。这种忽略主要囿于当时尚无关于郁达夫在南洋期间所留下的文字之总目或文集。在评析郁达夫早期的作品方面，李欧梵则从郁达夫自传体的创作方式来切入，进而分析其创作中的主人公皆有可能是以郁达夫本人的形象为原型。李欧梵的论著虽未肯定郁达夫在南洋的贡献，然而有关郁达夫的生平





整理可谓是早期较全面的研究。此外，该文亦肯定了郁达夫早期创作中所塑造的自我形象之重要性。

中国一直都是郁达夫研究的重镇，《沉沦》则是郁氏最常被研究的作品。《沉沦》的面世使得了不少相关的评论文章相继出现，惟其中多属直观式的印象批评。于1920年代末，钱杏邨（2010[1928]）在《达夫代表作》的后序属当时较全面的评论文章，该文以“苦闷”来贯穿郁达夫早期的创作（1921年至1928年间）。对于郁达夫从最初在日本求学阶段对性的苦闷，再转变到回国后对经济的苦闷，再到后来的政治苦闷，钱杏邨从郁氏的文本配合其生平背景来解读，再以“苦闷”贯穿其不同创作时期的重心，这可谓是当时对郁达夫相当独特及透彻的解读与归纳。



曾华鹏与范伯群（2010[1957]）曾于1950年代末对郁达夫于各时期的代表作做了较完整的评述。他们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论述郁达夫各时期的创作特色。曾、范二人从郁达夫早期的《沉沦》、《南迁》、《胃病》等去考察郁达夫创作初期的颓废情绪。他们于该文的第二部分以郁氏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始，并以《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为例，论述苦难的现实如何让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视人生，且带有反抗的革命狂热。至于第三时期，他们以《日记九种》、《一个人在途上》为其当时的代表作，以说明郁达夫虽对大革命感到失望，但仍怀抱革命的热情。第四时期则是有关郁氏在杭州的低产量时期，直至1935年，其《出奔》的出版显露了作者以坚决的态度表现了对“地主阶级”最大的愤怒。曾、范二人虽未肯定该作品的深度，但却肯定其时代意义与价值。至于有关郁达夫在南洋的部分，由于作者研究期





间，郁达夫的文章仍散佚于故纸堆中，未有人做出系统性的整理，故曾、范只能大略的论述，并肯定郁氏当时的政论文章对南洋的意义。对于郁达夫的前期生活与各创作期代表作的评析，此文无疑做了相当有效的整理，不过其切入点则从中国的大时代背景出发，其中难免以中国式现实主义的眼光去评定郁氏的作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郁达夫研究由于历史因素而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进入1980年代后才又出现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如温儒敏（1980）、许子东（1983；2011）、张恩和（1983）等等。除了李欧梵将郁达夫归纳为浪漫的一代，许子东（1983）于〈郁达夫风格与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亦以浪漫主义贯彻始终。虽文学界有研究曾提出郁达夫的部分创作实属现实主义的范畴，然而许子东认为所谓现实主义乃郁达夫的创作手法，而郁达夫始终是秉持着浪漫主义为其创作主轴。该文亦提出郁达夫无法在1930年代风行的因素，而最终将之归咎于其创作不能与时代相容。此文虽与李欧梵的说法有相同之处，但许子东更进一步的论证郁氏的浪漫主义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响，尤其是受影响的作家群。然而，此文并未能充分地将郁达夫的思想、生平背景与其论述结合，故并未能看到郁达夫的想法发展到晚期起着如何的变化。此外，许子东（2011）的〈郁达夫小说创作初探〉则浅析了郁达夫前期几乎全数的小说，这正好提供本研究有关郁达夫早期创作较完整的图像。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郁达夫到南洋前的创作之研究亦有否定者，甚至有者认为郁达夫为文学、社会带来了消极的效应。其中以苏雪林为较显著的否定声音，苏雪林（2010[1934]）在其〈郁达夫论〉中发表其对郁达夫的创作如何不





合时宜的看法，文中对郁达夫的批评虽有论证，惟部分用词过激而苛刻，故未能对郁氏的创作提出较理性的看法。另，该文完成于1930年代，当时的郁达夫仍属于创作的中期，任谁也无法全面地给郁达夫的一生下论断。又如萧乾（2010[1935]）于〈评《出奔》〉中认为郁达夫发表于1930年代中期的〈出奔〉与发表于二十年代初的〈沉沦〉相较之下并未见显著的进步。他认为郁达夫“……没看到当时革命高潮中，青年嘶喊和热血、因为他总忘不了男女那件事”（346）。可见，在现实主义的大潮中，郁达夫的作品常被一些较激进的批评家认为不够“现实”抑或太倾向于“感伤色情”等。直至郁达夫因二战殉于印尼，对郁氏的过激之评析始减。

在日本，有关郁达夫的研究亦有所发展，其中又以郁达夫早年的创作为研究核心。温梓川从一次与铃木正夫的谈话中得知，日本政府对于促进郁达夫的研究事业相当关注，其中还包括了拨款让学者研究（温梓川，2006，3）。铃木正夫表示日政府认为郁达夫是日本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战争后牺牲实属可惜，郁达夫像日本人，其性格亦然（温梓川，2006，3）。因此，我们可见在日本的郁达夫研究亦占有一定的位置。根据大久保洋子（2005）之研究，有关郁达夫在日本的研究可分为三阶段，即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为第一阶段（1927年至1945年），以伊藤虎丸和铃木正夫为代表的第二阶段（1946年至1989年），还有以桑岛道夫为代表的第三阶段（1990年代至今）。其中伊藤虎丸（1985[1964]）的〈《沉沦》论〉除了深度挖掘郁达夫的经历、气质、思想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文中更是极力探讨郁达夫小说与日本现代文学之关系与渊源。从有关日本对郁达夫的研究综述可见，相关研究厘清了郁达夫和日本的关系。

